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创建人

□ 郑建生



弓仲韬

展非常欣慰，他写信鼓励弓仲韬继续努力，并指示可建立安平县委，加强党对全县工农运动的领导。

为了落实李大钊的指示，1924年8月15日台城村、思敬村和北关高小三个党支部选派了弓仲韬、弓凤州等9名代表，在思敬村召集召开安平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建立中共河北省第一个县级党组织——中共安平县委。党的机关设在弓仲韬家中，将台城特支改为台城支部。这次会议确立了今后的工作任务，就是发展党组织，壮大革命力量，启发群众觉悟，领导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

弓仲韬在任期间，积极宣传和组织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白色恐怖中，有的背叛了革命，有的被右倾分子拉拢，而绝大多数党员坚守着执着的信念，与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为党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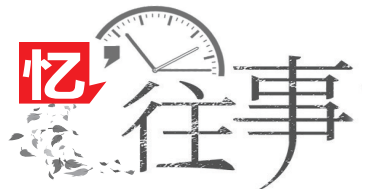
1925年，为了掩护党的机关，弓仲韬在自己家前院西厢房开办了一所“列宁小学”，对外称“台城私立女子小学”，让保定地方委员会特派员张鹤亭以教员身份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学校建立后，办学经费、学生及数名经常往来的地下工作者的食宿、县委办公经费都来自于他变卖土地等得到的上千元钱。为培养革命后备力量，他经常到“列宁小学”讲授革命道理、教唱革命歌曲等，使学生经过几个月的学习，思想觉悟普遍提高，其中6人发展为共青团员。

为解决贫困党员的生活问题，弓仲韬又筹措资金在家中开办了毛巾厂，此工厂也成为了许多革命者经常以联系买卖为名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弓仲韬家中研究党的工作的场所，一切费用均由弓仲韬负担。到1934年时，他的家产就所剩无几了。安平、饶阳一带的党团工作却在他的物质支持下不断发展，并且在安平县的影响下，衡水其他各县相继建立起了党组织。各级党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使衡水这片土地成为坚强的革命根据地。一些在京、津、保的党团员也回到家乡积极开展革命宣传，发展党团员。弓仲韬的大女儿弓浦在父亲的影响下于1925年入党，先后任台城女支委书记、中心县委妇女委员，1928年她在北京参加“三一八”游行时身负重伤，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弓仲韬一生都对党忠心耿耿，为党的事业勇于献身，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和大部分家产都贡献给了革命事业。他常说，作为共产党人，就要舍得出家财，豁得出性命。他变卖田地解决办学和办公经费，又变卖家产开办工厂解决贫困党员的生活困难。在他的影响下，全家都走上了革命道路，有的甚至为革命献身。

七事变后，弓仲韬与党失去联系，便带上卧病的妻子，毅然离开家乡到西北去找党。这期间妻子病逝，他流落到一家工厂当伙夫，仍坚持在工人中宣传革命道理，鼓动抗日，为此竟被工厂资本家于1942年害瞎双眼，踢出家门。1943年，双目失明的弓仲韬历尽千辛万苦返回家乡，并终于和安平县委接上关系，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和照顾。1951年由女儿弓乃如接到哈尔滨安度晚年。生活虽然不错，但他却常常伤感，有时甚至痛哭流涕。他说：“我不能为党工作了，我没有完成党交给的任务。”1964年3月，他病逝于哈尔滨。临终前他再三嘱咐：“一定把我节余下的一千元钱交给党，作为我最后的一次党费……”

（摘自2007年第4期《档案天地》，原标题为《中共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创建人》）



领导干部讲党课，宣讲马克思主义、介绍国内外形势和时事政治、解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一直是我们党的一项光荣传统和政治优势。在这方面，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身体力行，亲自讲党课，作出了表率。

“教员，给我们讲讲形吧！”

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红军教导队开学后，毛泽东很关心学员，经常抽空来给他们上政治课，讲解人民军队的宗旨和性质。在江西中央苏区，毛泽东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学员讲授“苏维埃运动史”课程，并常去苏维埃大学作《乡苏维埃怎样进行工作》的报告。

抗战时期，毛泽东经常到延安的一些高校讲党课。有一次，毛泽东等领导同志走进教室时，大家站起来热烈鼓掌。毛泽东微笑着摆摆手，让学员们坐下。他先介绍了跟随他来的几位领导同志，然后说：“我今天帮你们请来几位教员，有洋的，也有土的，我就是土的一个。”当介绍到徐特立时，他说：“他不仅是你们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

1937年4月至8月，毛泽东又在“抗大”开设了“辩证唯物论”课程。每周二、四上午上课，每次4学时，下午参加学员讨论，总共达到110多学时。

据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回忆：“有一个时期，毛主席经常到陕北公学来，陕公的教员和干部见到毛主席就说：‘教员，给我们讲讲形吧！’”（毛泽东说他是教员出身，所以同志们亲切地称呼他‘教员’）他也很高兴答应作报告。”

毛泽东第一次到陕公讲哲学课时，一开头就说：“今天跟你们讲一个翻天覆地的大问题。”把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哲学问题，说成是“翻天覆地”的大问题，学员们真是闻所未闻。毛泽东先讲唯物论和唯心论，后讲反映论和辩证法。这个讲稿后来整理出来，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文章。对此事，毛泽东在洛川会议前夕曾对郭化若说：“别提讲课了，最近我在陕北公学讲了一次，折本了”“我花三天四夜时间，准备讲课提纲，讲矛盾统一法则，哪知半天就讲完了，这不折本了吗？”

“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

毛泽东在讲课时善于根据说服教育对象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语言内容和表达方式，有的放矢、因人施言、对症下药，激起了教育对象思

毛泽东讲党课

□ 吴继金



想和情感上的共鸣。他强调：“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毛泽东指出：“在教学方法上，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教员也要跟学生学，不能光教学生……就是教员先向学生学七分，了解学生的历史、个性和需要，然后再拿三分去教学生。”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就多次强调和要求红军宣传员找群众谈话时，首先要放下架子，要看不同对象说不同的话。碰到雇农要讲雇农话、碰到中农要讲中农话、碰到商人要讲商人话、碰到工人要讲工人话，不能讲一大篇。

有一次，在给工人夜校上课时，毛泽东先在黑板上写下“工人”两个大字，然后对工人们说：好些工友埋怨自己命苦，说工人没出息，其实，说起来工人的力量最大。他提高声音说，大家不是说天最大吗？什么是“天”？他指着黑板上写好的“工人”两个大字说：“大家看，‘工’‘人’两个字连起来就是‘天’。”他指着“天”字启发工人们说，大家都说工人没出息的，我看工人是大有出息，关键是要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力量大如天。譬如一颗小石子，用脚一踢就踢走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粘成一块大石头，那就搬也搬不动了。这些针对工农特点的极其鲜明而朴实的语言，很容易为工人、农民所接受。

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举办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在讲课中十分注重根据学员特点来说明问题。据当时的学员回忆，有一次毛泽东讲课，在黑板上画了一座宝塔，一边画、一边讲，说：“你们看，最下层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毛泽东接着说：“压迫、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人数很少。只要大家齐心，团结紧，劳苦大众起来斗争，压在工农身上的几座大山都可推翻。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这种形象化的教学方法，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语言运用上，毛泽东既是高超的理论家，更是卓越的实践者”

毛泽东讲课时不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形式多样，且富于变化，而且十分注意语言艺术，生动活泼、幽默风趣，深受学员们的欢迎。

西安事变发生后，延安学校的师生们听说抓住了蒋介石，都欣喜若狂。可事隔几天，中央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不少人在感情上接受不了，觉得蒋介石杀了我们那么多人，又一向奸诈刁滑，不能轻易放虎归山。毛泽东来到红军大学给学员上课，他说：“蒋介石罪恶滔天，欠下全国人民无数的血债，大家要求杀他，可以理解，不算过分。不杀他，确实不能平民愤。但是，蒋介石是不能杀的，在目前的形势下，杀了蒋介石，会使国内形势更加复杂和混乱，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何况杀了一个蒋介石，还会出现第二、第三个蒋介石。诸葛亮对孟获还搞七擒七纵，我们对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一擒一纵呢？”台下有人提问：“如果蒋介石不谈判，不接受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主张怎么办？蒋介石心狠手毒、毫无信义，放了他，他会抗日吗？”毛泽东听后，风趣幽默地说：“你们看，陕北的毛驴很多。毛驴驮了东西是不

愿上山的，但是陕北老乡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当然喽，要拉得很紧、推得有力、打得得当，驴子就被赶上山了。西安事变就是这样。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战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是大势所趋。但是，驴子是会踢人的，我们要提防它，这就是既联合又斗争。”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在谈到党内存在的“学风”“党风”“文风”有些不正时，说：“这些作风不正，并不像冬天刮的北风那样，满天都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现在已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这不过是一股逆风，一股歪风，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但是我们党内还有这样一种风，是不好的。我们要把产生这种歪风的洞塞死。我们全党都要来做这个塞洞工作，我们党校也要做这个工作。”从而形象地说明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必要性。

还有一次，毛泽东在上党课时把日本侵略中国比作一头疯牛冲进了中国，我们正面和他直接对抗暂时抗不过，怎么办？靠持久战、游击战和全民族抗战。有扳牛头的，有拽牛尾巴的，有薅牛毛的，有砍牛蹄子的，最后的结果是这头疯牛必死无疑。听课学员在会心的笑声中感到受益匪浅，终生难忘。

毛泽东讲党课面临的对象来源复杂，思想基础、觉悟程度、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有工人、农民，也有高级知识分子。但毛泽东“以通俗的语言，讲亲切的经验”，能吸引每一个人，使文化水平低的感到通俗易懂，文化水平高的也不觉得粗浅。

萧三在上世纪40年代曾评论毛泽东道：“他的报告、演说、讲话，是那样明白、浅显、通俗、动人，富于幽默、妙趣横生，而又那样意味深长、涵义深刻、左右逢源、失无虚发。他的说话常是形象亲切、有血有肉的。在同一会场里，工人、农民、兵士、老太婆们听了他的讲话不以为深；大学教授、文人、学士听了不以为浅。”

（摘自2018年第5期《世纪风采》）

民主生活会制度的由来

□ 邢 浩

强党性的办法。

1942年，为清除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毛泽东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坚持用整风方法解决党内问题。延安整风通过倡导和践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使党内民主得到了极大发挥。延安整风为我们党建立民主生活会制度提供了鲜活实例。

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强调，“党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发扬党内民主，鼓励一切党员、党的基层组织和地方组织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加强上下级之间的生动活泼的联系”。但随之而来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大跃进”运动等，使党内民主难以实现。后来“文革”的爆发，又使党内民主生活制度遭到严重破坏。

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各级党委或常委都应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交流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生活会制度第一次在党内法规中被确定下来。

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提出：“应该从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着手，使支部生活健全和活跃起来，切实改变许多基层组织长期不开小组会、不开支部大会、不上党课、党员不起作用等等组织涣散的现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80年制定公布《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1981年8月，中组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健全县级以上领导干部生活会的通知》。这是我们党第一次以党内文件的形式对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作出的具体规定。从此，民主生活会开始真正走向制度化。

（摘自2017年第11期《新湘评论》）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修订通过的党章首次规定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参加党委、党组的民主生活会。民主生活会制度被正式写入党章。

（摘自2018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



『三会一课』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 孟庆云 李鉴修

作为党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支部党员大会、支部委员会、党小组会和定期上党课的相关制度，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

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要求“支部、区部委员会以及中央委员会至少每两周开会一次”“盟员至少每三个月同所属区部委员会联系一次”。这是关于党的会议制度的最早规定。列宁在创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过程中，强调党是有组织的整体，党员不但要承认党纲，更要“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

党的二大通过的我们党第一部党章对党小组、党支部、地方全体党员会议和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的期限作出了具体规定，如各组每星期由组长召集会议一次。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要求“从党内教育做起”，通过党报、简报、小组会、支部会、党员大会、政治讨论会、参加实际工作等教育方法，来解决“思想上建党”的问题。延安整风期间，中央《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提出领导干部必须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党的七大对如何开展党内民主生活、加强党内教育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指出，党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发扬党内民主，鼓励一切党员、党的基层组织和地方组织的积极性